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Flow* and an interview with Ai Weiwei

Zeng Jinyan

《人流》是艾未未首次以电影媒介的形式就世界重要人权议题进行创作。观看过程中，我潜意识里将《人流》反复和艾未未以往的影像作品进行比较，时不时对“艾未未元素”会心一笑。通过《人流》，艾未未对全球化处境下人类流动进行拷问。相比较其以往创作，电影对采访素材的选取十分克制，通过画面和音乐讲故事的能力明显增强。和以往艾未未工作室出品的纪录片对事件的直接记录不同，《人流》更偏重于再现艾未未概念化的追问。而在影片呈现结构上，不了解是否受制片公司 Participant Media 的影响，很难说具有原创性。

艾未未在影片中的角色，估计是此片争议最多的一个话题。电影的真实和现实中的真实可以不同。影片中的真实需要影片本身铺陈说明建构完成。哪怕纪录片的画面声音都是来源于真实生活的瞬间，但纪录片的剪辑和呈现是一个过程——建构电影中的真实、甚至走向虚构、再在虚构中表现比瞬间事实更加真实的社会现实——这就是导演手中掌握的力量。艾未未在其他媒体采访中解释自己在影片中出现的立足点主要是他自我认同也是一个难民。而我在影片观看中，开始并不能明白他的身影出现在影片中担当的功能，随着影片的推进，我认为他在影片中更像是一个民间故事里凡人、天神、疯魔结合的吟游者、说书人、浪人形象，戏谑穿插行走于战争废墟、难民的迁徙中。如果荷马是真实存在的，那影片中的角色“艾未未”（以下加引号的“艾未未”皆指影片人物，不加引号的艾未未指银幕外现实生活中的艾未未），完全可以进一步塑造成当代“荷马”的形象，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会突然穿插在空间跨度巨大的战乱、流亡、边界隔离现场。航拍镜头和“艾未未”拥有代表说话权力的摄影剧组在影片中的呈现，使得“艾未未”有了神的角度来看人间。航拍镜头跟随着难民人流越过欧洲大地的河流、亚洲地区的森林，那是历史上讲述战乱人类大迁徙的直接视觉表达——我提醒自己这不是剧情片的特技，而是一部纪录片的真实影像。他与难民交换护照的镜头与其说是艾未未自身难民身份的说明，不如说是“艾未未”对人类历史上再次发生的大灾难的一次恶作剧、嘲讽，我不否认艾未未的身份具有流民甚至政治难民的性质，但在现实处境中，他能动用的资源和难民的一无所有实在是对照悬殊。而“艾未未”在街头与小贩打交道、为人理发以及被人理发、在人群中跳舞，十分具有艺术家艾未未的色彩，在不了解艾未未的观众眼中可能觉得突兀，而在我眼中，那是艺术家艾未未作为“玩笑者”搅动不同文化及现有社会结构的本色演出。相对于政治正确、义正言辞等形象来说，艾未未更加看重的对话因素，可能是幽默、游戏、甚至娱乐，哪怕是在巨大的人类灾难面前，保持这样的一种日常态度反而格外重要，是彰显人类生命力的一个面向。

《人流》并没有紧跟任何具体个人的叙事，全片看完能够记住的人物名字，可能也只有“艾未未”了，其他人物的故事，都是全球难民议题中的一个小片段。艾未未的兴趣，我认为着重于质问难民大规模流动的成因和障碍，质问各种边界高墙的合理性。因而影片的结构上，也沿用了艾未未常见的宏大主题和概念化讨论的风格和手法，包括通过航拍达到的视觉效果和让难民排成行在摄影机前展示无声的面孔，摄影机的强势权力和难民的失语面孔同时在场。用难民母国重量级诗篇片段来分割影像中版块章节的手法，在很多跨国议题人权相关的纪录片里都有采用。比如《人流》制片公司负责影片的首席影响官员（Chief Impact officer）Holly Gordon，她之前联合发起了“女孩崛起”运动，其中电影《女孩崛起》（Girl Rising）的手法，是以所在国的作家参与剧本写作的方式，来代表这些底层无声者的声音。《真話禁不絕》（Forbidden Voice）里是直接呈现不同主人公的写文本作为影片板块章节之间的过渡。这种采用难民母国最优秀的诗歌片段的方法，使得《人流》脱离新闻性、事件性和塑造人物等纪录片手法，而是给出了历史的、文学的语境来理解难民的处境，拷问也有了哲学意味，具体的个人反而退后，成为航拍画面下蚂蚁一样的存在。

如果说，土地和天空是人人生而有之、全球共享的资源，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那么，这种理念，究竟是一种乌托邦还是一种修辞？因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里，土地和天空被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分割，人类流动——从恶劣处境往美好生活的可能性上升——被国土边界上绵延不断的铁丝网、挡板、栅栏和全身武装的巡逻者阻断。这些人类流动的物理障碍割断墨西哥与美国边境上人们相互拥抱的可能，将加沙地带变成当地居民一辈子的囚笼，将南欧、西欧一分为二为野蛮战乱和现代文明之地。高耸分割沙滩绵延伸入大海的隔离墙画面，视觉冲击十分强烈：大海和天空居然可以这样被直接瓜分！而当冒死乘船漂流过海的难民终于获得欧洲文明国家的搭救，却穿上了整齐划一的服装、住进类似展销厅大棚的建筑里整齐划一的无顶单元格里，这些画面对我来说都是极其震撼的。因为人不再是人，不再是丰富而具体的个体，而是不分肤色、不分性别、没有面孔、行动整齐、背景单一的集体的一部分。住在单元格里的小女孩说，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无聊的生活。

这，是艾未未的视野，艾未未的声音。[Not included in the translation - GD]

2017年9月，我对艾未未做了一次书面采访，谈论艺术家的自我、刘晓波的死亡以及世界公民或者说流民的身份想象。以下是书面采访原文照录。

曾金燕对艾未未的书面采访¹

曾：曾金燕

艾：艾未未

曾：我首先想了解的是，是什么驱动你的艺术创作？在你的创作动机中，自我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

艾：在现实中，每个人都在找一个方法来表达自己，艺术是一种好的方式，它以不同的方法和角度言说你是谁，你怎么看你之外的世界。这并不是说从最初我就有这种感受，而是在逐渐的表达过程中，这个所谓的我是在表达中出现的，而不是本来有的，本我还没有形成。艺术表达是形成自我的一个方式，也是使生命出现价值的一个可能，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有的人是需要通过自己所设定的一个目标，比如科学家或者是运动员。对我来说，艺术给了我最大的可能来实现自我。但是这好像只是一个选择，说到怎么做艺术创作，我实在是没有什么经验，虽然我做的很多，应该算是做展览最多的艺术家。但是，我的每一次创作都像是从来没有做过一样，都回到了一个归零的状态，给我机会能够有最大的幅度去重新定义，有一些挣扎、困惑和不安，这些因素是创作所必须附带的条件，从中才会获取快乐或者新的自我认同。所以说，自我在创作当中是一个似有似无的东西，它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你需要抵抗它的出现，有时候你又需要通过它的出现来肯定一个新的存在状态。

曾：艺术家通常担当着“玩笑者”的角色，搅动不同的人群、权力和文化的固有现状。中国的艺术家和欧洲、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艺术家，在社会上担当的角色有什么不同？你认为欧洲和美国艺术家面临的障碍、文化内部禁忌或外部的文化审查，有哪些？

艾：每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艺术家都受到他自己的语言，文化的现状和本来的历史的限制。在这些限制中，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面临的最大的限制是现实存在的严酷的政治审查制度，和对历史的割裂、曲解的态度，这两者足以使中国社会中的艺术发展和艺术教育受到最大的程度的损害和扭曲。剩下的，我们称之为中国文化状态的一些现象，基本是在这个

¹ 2017年9月25日曾金燕將採訪問題發給艾未未辦公室，10月4日收到艾未未的書面答復。

范围中，谈到的文化现象，这就很难一个一个举例子了，只能说它的总体状态是这样的。其他国家，这里主要说的是欧美的艺术家，因为艺术被提到一个推动社会发展的独立性的社会角色，在欧美是这样定义的。在其他很多国家，艺术本身跟工艺，或者是与一些装饰美化有关。在欧美，艺术担当了类似于哲学和伦理学角色，并有社会批评，相对来说比较前卫的文化角色。但是，并不是说欧美的艺术家就一定具有这样的品质，它只是一个社会的需求，欧美艺术家在大多程度上仍然处在一种所谓的民主和自由框架下的极其虚幻的状态，意味着它的社会的本质性的矛盾是近似于乌托邦的，回避了很多真实矛盾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它仍然面临着巨大的虚假性和空泛的话题，它的障碍和它的禁忌也是深深的渗透在它所有的文化机构、评选机构和价值体系之中，或者资本流动的可能和市场上，从总体来说是这样的。

曾：“玩笑者”的角色，在很多政治、社会行动的论述中，是不被接受的。有时，你被一些人批评对中国问题不负责任。你也曾经说你没有朋友。你如何理解并处理作为一位艺术家和一名中国异议者的身份之间的冲突？

艾：我猜测你说的“玩笑者”是一种玩世不恭或者是一种调侃的角色。实际上，我可能比大多数人在面对美学和伦理问题上要严肃的多。只是我以许多不同的姿态在谈论这些有点严肃的问题，在许多的政治社会场景当中，它的严肃性实际上是需要被消解的，因为在那里根本不具备严肃讨论任何话题的语境。在西方是具有这种不同层次和深度讨论的语境的，但同样，如果这种讨论在需要被社会层面所接受的时候，它的脆弱和狭隘也会显现出来。

当有人认为我对中国问题不负责任，我觉得我根本不具备可以负责任的基础。如果一个人的个体存在都受到威胁的时候，这时谈到“负责任”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我说“没有朋友”，主要是针对刘晓波说他“没有敌人”而言的，我与刘晓波是曾经的朋友，我不愿意看到他这种具有道义上的大而化之的说法，这有悖于一个抗争者的基础担当。

一个艺术家和异议者的身份实际上是不具备冲突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当时的异议者的身份，如果不具有异议含义的艺术家，实际上他创作的价值对他的时代没有做出新的定义。所以这两者并不存在冲突。

曾：我注意到在推特上你和一些网友就刘晓波有些争论，是什么让你感到愤怒或者失望？

艾：我一直在谈论的是刘晓波的政治观和他存在的政治价值。我厌恶的是很多人使用煽情的方式，掩去了谈他的社会价值。犹如诺贝尔奖，或者用悲情的方式去谈他的病况，而回避了中国的政治的普遍的严酷性。刘晓波的存在和他的悲剧是中国社会政治的悲剧，中国知识分子极少能够真正认同他所体现的价值观，而更多的是在谈一些和刘晓波存在的价值无关的东西，比如说，一些人介入所谓的与刘晓波的私交或者某种特殊渠道，在他生命逝去的关键时刻，曲解他的政治立场和表达。例如“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西方世界”，诸如此类观点，这对我来说，这不仅是对刘晓波个人的诋毁，同样曲解了刘晓波所为之献身的政治理想。

曾：我依然记得你请我的几次聚餐。你似乎很喜欢和别人一起吃饭，一般是很多人，是什么让你这么喜欢和别人一起吃饭？你曾经和刘晓波或刘霞一起吃过饭吗？如果一起吃过饭，你们谈什么呢？作为刘霞第一个中国展览的策展人，你可否告诉大家当时策展的情况？你当时为何决定做那个展览？

艾：中国人很多时候在饭桌上显得更加轻快，也很容易了解，是一种共同的需要吧。更深层的原因是很多人聚餐可以点很多菜，选择性多一些，我是喜欢有选择性，害怕受到拘束的人。不记得刘晓波刘霞一起吃过饭，但是和刘晓波，在他89年回国之前有一些时间在一起。他放出来以后，和他一起在我的一个餐厅吃过饭，谈的是一些跟政治毫无关系的嘻嘻哈哈的事，刘晓波也可能并不喜欢谈那些，我们基本上是在瞎聊。我帮刘霞做过她的第一个摄影展，是应刘晓波的要求来做的，在我的一个画廊。看的人很少，晓波，做出这个展览的决定是看在晓波作为朋友的份儿上，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曾：刘晓波7月13日去世，你如何描述他？他对中国的政治、社会运动有什么贡献，局限又在哪里？在后刘晓波时代，你有什么信息想要传达给致力于中国社会政治改变的活跃分子们？

艾：我觉得，并不存在所谓的“后刘晓波”或前刘晓波时代。以一个政治人物划代，它必然是以他对公众的政治思潮影响具有分界点的一个时期，在中国这个时期从来不曾出现过，他在后89之后没有什么明显的政治影响力，即使是零八宪章，也是没有明显的政治影响力。

我个人属于致力于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的活跃分子，曾经或者是现在，一直被人这样认为，至少中国的政治当局者们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中国如果说社会政治改革，重要的是要致力于中国人本身对自己文化和政治现状的认识，这是一个具有复杂层面的问题，中

国的问题不只是政权形态的问题，也不仅是制度问题，中国的问题更大的是来自其自身文化和民众能否够应对和适应政治改变的思想准备，这个准备是极为欠缺的，底子也非常薄的，这正是变革迟迟不能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曾：你会怎样描述刘霞的现状？尤其在刘晓波去世后，你怎么看待刘霞在中国的生存方式？

艾：在刘晓波生前和去世后，关于刘霞我都没有第一手资料，从我在推特上看到的种种表述，我觉得大多数的表述是有失真实状态的，许多只是来自表述者自己的心理状态。刘霞显然是处在中共的控制当中，但是同样的话，也适用于每一个在中国生活的所谓的公民，没有谁可以说他不是处在这个状态。刘霞受到了极为不公正的待遇，这跟刘晓波的政治选择有关，这是在极权政治下抗争的必然结果。刘晓波去世以后，刘霞应该获得完全的自由，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已经为了他的抗争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现在她在中国的生存现状具体如何，我不能做出判断，因为在中国，所有人的生存方式都是与专制政权达成的某种协议的方式，不承认这种扭曲的协议的普遍存在，实际上是对专制政权的不了解。

曾：在柏林居住几年后，你怎么看待你和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的关系？

艾：我和中国的关系并不取决于我在柏林住几年，或者没有住，或者之前之后。我和中国政权的关系属于一个长期的恒久不变的对立关系，因为中国的政治现状和我个人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在柏林使我能够超脱于必须受到限制的生活境遇和现实焦虑，免除危险，使我有机会去处理有更多的更加宽泛的人权和人道主义危机的问题，更多的关注我的艺术活动。因为我始终秉行一个基本的信仰，即人权和言论自由是一个共享的价值，而不是一个局部性的话题。

曾：你是否曾经感到孤独或恐惧？如果有，你如何描述它们？你是否有对政治暴力、不能扎根或其他东西的恐惧？

艾：如果有孤独和恐惧感，它更多的来自于对某种思考或某种原则在表述时所遇到的交流的困难。对所谓的政治暴力和蛮横，我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困惑或恐惧，因为我一直生长在这种环境中的，可以说我也不具有国家或者国土的这种浪漫主义的情节。

曾：我经常看到你对国际上的各种人权事件发声，比如最近的《人流》及相关项目。我的理解，你已经是全球社会不公的一个强有力的发声者。是否可以说，你在创建你的版本的世界公民？你怎么定义世界公民？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个人如何做一个负责的个体？

艾：这一年多，我的主要活动是跟难民问题相关的研究，由研究产出的一个主要产品是《人流》纪录片。这个大型的纪录片使我有机会去到世界不同的地区，了解复杂的人权状态和对于人的尊严的不同的理解。无论是在中东、亚洲、非洲还是欧洲，近期对人权和人的基本尊严的理解可以说是令人失望的。

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尽管我今年60岁了，我并不具有在任何一个国家选举或者投票的权利，我的主要的行为领域是在社交媒体，可以算是一个现代的吉普赛人吧。我所能做到的是在有限的时间，在我个人的经验里，尽多可能的谈论一些基本的关于言论自由、个体尊严和人道主义相关议题。

谢谢你提出的问题。